

丁逢白著

#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夢之志者指之

西北出版社印行

#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 一、緒言——歷史的再認識

『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這兩句話，是值得我們深加注意的！一般高調實踐的人，只知道行動是產生理論這一真理，而沒有了解由行動所產生出來的理論，又可以指導行動這一真理。要實行革命，要推動歷史的發展，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工作，如果沒有理論以作行動的嚮導，結果，他的革命行動，便常常錯誤而不會正確。所以加緊理論的研究和認識，在行動時便可減少錯誤，預防錯誤，今天為社會發展作推動作用的人，應該不要忽視這點。

不幸得很！中國的一些『好高務遠』的革命家，尤其是一些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自吹自擂的先生們，他們把偉大的革命行動，完全建築在感情主義上面，以盲動代替理論，以感情代替真理，以致十多年來，都一貫地在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的交互演進之下，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一



3 1797 7884 4

MG  
D693.0  
470

對中國的社會，作了不少消極的破壞工作。如果我們一定要免強歌頌他們有如何偉大的成功，那末，主要的成功，我以為就是『破壞』兩字。革命固然離不了破壞，但破壞絕不是革命的目的，因為一種正確的革命行動，往往是與建設相輔而行，破壞的開端，就是建設的起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卜列哈諾夫（Plekhanov）先生，曾經在『自然和歷史的突變』一文當中，一再地提及了這個問題；可惜中國的共產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只知高呼信仰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常常不懂得馬克思主義，或反而披着馬克思主義的招牌，實着着既不合於馬克思主義，又不合於三民主義的『盲動』。這是說，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的功績，只有消極地破壞，而沒有絲毫積極的『建設』意義。無論從經濟政治和文化三方面來看，都是如此。然而中國共產黨不知從這些地方去加以反省，去加以一番理論的檢討工作，反而大吹其牛，昧着良心來維持自己尊嚴，掩飾其錯誤。比如目前中共的中央總書記洛甫張聞天，在其所著『十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書當中，簡直把中共對於中國革命認識的錯誤，以及由此錯誤所演成的很多事實，略而

不談，反認爲絕對正確，以便欺騙後一輩的青年再去上當！這是對於理論的抹殺，對於真理的誣蔑。他們不去教訓青年認真去學習理論，以便利於行動，不去教訓青年重新去認識歷史，重新檢討過去的錯誤，因此這一般人只有毒害青年，只有毒害中國的革命。

歷史的車輪，始終不斷地在向前旋轉，中國的革命，雖然因了中共的盲動主義與機會主義的斷送而宣告了破產，宣告了此路不通，但革命的失敗，並不就是歷史的停留，客觀的革命任務依然存在：依然需要我們去完成。於此，我們（特別是中共）對於過去的歷史，就有重新再認識之必要。

歷史的再認識，主要點就是在於過去一九二五——二七年時代的大革命之檢討，一個有深刻意味的『革命回憶』，不僅是回憶而已，應該仔細地去研究它。中國共產黨自然早就注意到了這一個問題，而且在這次革命失敗後，曾經竭力糾正過在大革命時代的錯誤。比如一九二七年有名的『八七會議』，開除了譚平山的黨籍，取消了陳獨秀的領導權，一九二八年中共的六次代表大會，據說是徹底肅清了過去的機會主義，糾正了

過去一切的錯誤。然而在事實上，不論「八七會議」或「六代大會」，不過是由此一錯誤到另一錯誤之轉換，由機會主義的極端到盲動主義的極端，不論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都不過是典型的錯誤政策而已。

✓ 中國共產黨，直到現在還沒有了解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對於中國國民黨的認識不足，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了解不修，以主觀的幻想，代替客觀的事實，因之，其失敗乃是必然的道理。中共在當時並沒有從中國經濟之發展上去認識中國革命，並沒有從中國政治之由割據到統一這一條下去了解完成民主革命的重要，只是迷戀於工農的勢力，並且故意誇大了工農的領導作用。彭述之在『嚮導週刊』上那篇『誰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文，可以代表當時中共對於工農的領導作用迷戀之深。中共在當時第一：不了解國民革命在實質上是以國民黨為主導，是國民黨應該起來完成的民主革命工作，共產黨之參加，完全是做的國民黨的工作。因此，在當時只有一個代表民主勢力的國民黨，整個的革命重心，都應當在真誠地擁護國民黨來完成民主革命的

階段上努力，共產黨雖然儘管懷着了未來的理想，但所做的完全是國民黨的工作。共產黨於是只有共產主義之名，而具有三民主義之實。可惜共產黨在當時雖然是以三民主義的立場來參加了革命，却沒有真正了解擁護中國國民黨來完成民主革命之重要。同時更沒有了解國民黨在這一革命運動當中的主導作用與決定意義；事實上，就是對於國民黨的力量過於估計不足，不但中共有此錯誤，就連當時第三國際的領導者，同樣也犯了此種錯誤。第二：誇大工農的要求與作用，不明白廣大的工農運動之興起，並沒有超出反帝反封建兩大要求，這兩大要求，正是國民黨所要完成的。因此，工農運動的興起，與其說對於國民黨有害，毋寧說對於國民黨有益。中共忘了當時中國的社會，正是由封建制度到資本制度之過渡，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是代表當時民族資本勢力的發展，民族資本勢力在國內剛剛具有了較強固的基礎，真正的工農力量，絕不會成正比例的增加，反之，還要退後一步，因為他們還沒有由『自在階級』到『自爲階級』的境地。如果說，中國因了長期的國際資本主義之侵蝕，因而培養出了廣大的工農力量，那末此種力量

一定是反帝運動的基礎，在中國沒有獨立自由以前，其革命的要求與作用，也超不出民主革命的範圍，這就是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之特殊性，與蘇俄的由二月到十月那斷革命事實，絕不相同，中共把當時多量帶有原始性和民主性的工農運動，誇大估計，以原始的農民意識來決定革命意識，於是越俎代庖，阻撓北伐的陰謀政策便由是而起，並且處處應用人工的泡製方法，來誇大工農的作用，這樣，中共便摧殘了民主革命；而真正的工農羣衆，也沒有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之下，從積極方面來參加其應完成的民主革命工作。

中國一些共產黨同志們，自今還不知道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之中輟，是共產黨的錯誤，是共產黨正當國民黨走進步道路，主導地領導國民革命的時候來實行越俎代庖；反而罵國民黨反革命，罵國民黨離開了革命立場。不知阻礙北伐，阻礙民主革命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國共產黨自己。中共在『八七會議』過後之所謂反機會主義路線，開除了譚平山，取締了陳獨秀，仍然證明了他們還不了解革命失敗的原因，盲動主義的開端

，其實即是機會主義之再現。我以為譚陳二先生的錯誤，不在其堅持擁護國民黨的國民革命以完成北伐，而在其不善於領導『原始性』的農民運動，只知消極箝制農工運動的『過火』，而不知積極地去『誘導』其過火的原始的鬥爭。第三國際在當時更不了解中國的國情，特別是托洛司基本人，認為那次革命的失敗，是中共沒有及早脫離國民黨，沒有及早成立蘇維埃，（見托氏著：中國革命問題）不知國共的分裂，北伐阻撓，全由中共神經過敏，趕造革命所演成。中共只知罵國民黨是屠殺農工的劊子手，忘了真正斷送農工性命的，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托洛司基乃至於托洛司基派人，自今還不了解當時原始性的農工運動，絕不可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如果領導不善，反有阻礙歷史發展的危險。總之，過去大革命時代的歷史，有重新認識和重新檢討之必要，到底是陳獨秀譚平山斷送了那次革命？還是中共的盲動主義斷送了中國革命的前途？

## 一一、十年來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檢討

因為中共沒有真正了解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敗的原因，故自『八七會議』以



後，即爲盲動主義之開端，國共正式分裂過後，中共的整個政策，都真注在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上面，而有名的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都由此一錯誤政策所造成。中共特別誇大了「廣暴」的歷史意義，認爲是『廣州公社』，顯然以之與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相比擬，並認爲是無產階級退兵時之一戰；不知自『八七會議』以後，中共已經逐漸與無產階級與緣，中共的一切政策與主張，不但一天一天地離開了無產階級，反而變成了絞殺無產階級的武器。爲什麼？

因爲農民的原始暴動已經失敗，真正農工在此時的要求，不是盲動而是退守，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不是直接鬥爭，而是合法運動，中共在民主革命高漲時既誇大了原始性的農民運動，實行越俎代庖，中輟了國民黨所領導的民主革命；在革命失敗過後，又不知鳴金收兵，反而擂鼓前進，這不是革命，而是開玩笑！

八七會議以後，自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有名的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莫斯科召開，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並認爲要使得民主革命的勝利，『

必須反對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勢力的國民黨』，所以此一革命的動力，不是中國國民黨，而是中國共產黨。中共既然把推翻國民黨爲其主要目標，因之他們之所謂反帝反封建，其實即是打倒國民黨之別名，所謂『三大要求』，所謂『十大政綱』，（見中共六大大會政治決議案）並沒有真正執行，而打倒國民黨的工作，却是他們的當前任務。中共既然對於國民黨的了解不夠，抹殺了國民黨的民主革命意義，更抹殺了國民黨能實行民主革命的工作，於是以偏激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代替真正革命的意識，他們只看見了國民黨一時離脫了民主革命的立場，而不知此正是共產黨錯認歷史，盲目革命所造成的罪惡！在六大大會中，中共曾檢討了中國革命失敗的客觀原因，認爲是：（一）帝國主義的力量強大；（二）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三）地主領導的軍隊力量很大；（四）工農發展的不平衡；（五）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六）機會主義的錯誤。中共在革命失敗過後，仍然沒有真正檢討出失敗的原因。既然明白了帝國主義的力量很強大，工農發展的不平衡，那末過去爲什麼又要在國民黨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時候來推翻國民黨？爲什

麼要在工農不平衡的發展之下來實行越俎代庖？可見六代大會，仍然沒有把過去失敗的主要原因糾正，反從此而更向盲動主義的前途發展。

六代大會以後，以向忠發代替瞿秋白的領導，而實際大權，則全操諸李立三之手。如果說，立三路線是盲動主義之結晶，那末，六代大會，則是盲動政策之總的指導。誰能否認，李立三所執行的政策，不是六代大會的決議案，並且會由第三國際布哈林史××所批准下的盲動政策？六代大會認為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很快到來，中國的蘇維埃運動，首先就有一省數省勝利的可能，李立三是很忠實地執行了第三國際乃至中共的盲動政策，而李立三却犯了盲動主義之罪而被打下台，這與陳獨秀譚平山之犯了機會主義之罪而被打下台，情形完全一樣。李立三時代的盲動主義，完全是『八七會議』與『六代大會』的盲動主義之延長，中共反認為自『八七會議』以後才開始了布爾什維克化的轉變，未免自欺欺人！事實勝於雄辯，中共如要誇大八七會議與六代大會之偉大（？）的成功，那末充其量只是批判了一些枝節上的錯誤，而盲動主義的本質，仍然沒有

改變過來。

李立三因爲忠實於盲動主義的路線而被打倒了，但推翻國民黨政權，和一省幾省蘇維埃運動的首先勝利依然未變，依然還承繼着『六大大會』的決議案在執行。這到底是李立三真正的錯誤？還是李立三不善於拍馬屁，不知仰承第三國際的鼻息？三中全會，據說是糾正立三路線之開端，但三中全會也並沒有把立三路線糾正過來，只批判了一些李立三在執行盲動主義時所犯的一些技術上的錯誤。在中國共產黨內，因爲黨的成立是外鑠而不是自發，所以國際官僚主義的腐化與錯誤，便支配了中共，因此，中共在黨內的一般黨員，缺乏了活的靈魂，只有些死的機器，李立三主義之來源與實質，在反對李立三路綫的號召之下，無形中便被掩飾起來，於是李立三成了共產黨內的罪人，只好輾禁在外國，這與張國燾在過去之被扣留，情形如出一轍。這種『貽禍於曹』的辦法，竟欺騙了中共黨內好多誠懇純潔，努力革命的同志，中共美其名曰到外國去悔過，學習革命。

瞿秋白畢竟是一個老於世故的人，他明知李立三的盲動主義，不但執行的是『六大大會』的決議，而且是根據第三國際的指示，當作聖旨一般的在奉行；他明知李立三的錯誤只是盲動得有些過火，盲動得有些狂妄，使第三國際不高興，不便駕御。所以瞿秋白在三中全會當中，並沒有指出李立三主義的錯誤，只是作了一些枝節的批評。（均見中共過去所出版之『實話』刊）這證明了瞿秋白這個書生尚有良心，還不願意拍馬屁以討好國際，出賣他多年的工作老友李立三！這無怪乎中共在『四中全會』的決議案中，認為過去的中共中央，特別是瞿秋白『沒有去揭發立三同志的路線，反而給以根據去解釋立三路線是正確的路綫，是和國際決議一致的路綫。』（見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瞿秋白既然不識抬舉，不願意當阿Q來和小D作鬥爭，於是只有滾蛋，只有下台，這便是中共黨內所謂瞿秋白兩面派手段之由來，文弱書生，遂不能不發生日暮窮途之感，無怪乎瞿秋白在臨刑時要大賦其『心持半揭萬緣空』，『黃昏已近夕陽紅』，真可謂英雄末日，誰悲失路之人了！

羅章龍何孟雄等不免老實得可憐，他們拚命的在反對李立三路線，不知李立三路線不但是國際指示的，同時更是『六代大會』決議的，中共當中這一批老布爾什維克，似乎還沒有把李立三主義的來源與本質看透，更不明白反立三路線的真意，不在徹底打擊其盲動政策，而在取締不服王化的李立三英雄，代替以一批更忠實，更奴化的人物，以便於國際之操縱指揮而已。所以羅章龍等的反立三路線並沒有收效，反而得罪了瞿秋白等一批老於世故的人。非常會議派的成立，只獲得了一個羅章龍右派的臭名，他們高擎反立三路線，反陳紹禹（此處可以不必註明即王明）等的旗幟，但又擁護國際路線，其實是對於革命投機，企圖以此買好國際，把持中共的黨權。不知陳紹禹等奴才，早變成了第三國際的忠實走狗，更有米夫<sup>三三</sup>爲其後台，所以羅章龍與陳紹禹交戰的結果，初則無分勝負，繼則漸漸不支，最後是羅章龍何孟雄等的失敗。因爲陳紹禹等特別發揮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精神，派人在上海公安局告密，於是羅何等非常會議派重要人物數十人，全數落網，非常會議派與陳紹禹派之一場龍虎鬥，告一結束，然而這畢竟是所謂布

爾什維克的鬥爭呀！四中全會，是中共徹底肅清立三路線的一個重要會議，在這一會議當中引起了留俄派與羅章龍派之爭，這一會議的偉大意義，就是李立三充軍，羅章龍落網，對於中共的盲動主義政策，仍然未被肅清。所以一省數省蘇維埃的首先勝利這一盲動政策，由江西到四川，中共在竭全力以求實現。四中全會對於立三路線的批評，第一，在指出李立三有半托洛司基主義的傾向，因為李立三根據了一省數省蘇維埃運動的首先勝利這一原則，進一步企圖總暴動，爭取中心的都市，以作為革命勝利之根據地，並且認為：革命勝利後，革命政權的轉變，就是革命性質的轉變，當中並沒有多長的停留時間。四中全會認為：『他用托洛司基否認革命之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階段的觀點，來代替列寧的革命轉變理論，這就表現他對於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任務，完全的不了解，否認中國國內的革命發展不平衡，不理會中國政治經濟環境的特殊性，所以立三路線就取消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據上引的文件看來，四中全會的批評，糾正了李立三的盲動主義了嗎？沒有的，只是攻擊李立三的過火革命。不

知李立三主義之發展成爲盲動主義的高峯，就是根源於一省數省蘇維埃勝利這一左傾盲動政策而來，李立三並沒有反對過這一原則，反之，他就是這一政策之高調者和執行者。在立三路線指導下所出版的『紅旗』，『布爾什維克』……等刊上，不是幾乎千篇一律地在宣傳一省數省蘇維埃之可能成功嗎？盲動主義，是一個錯誤政策，不能走通；中共及第三國際，待別人碰壁後完全歸過於人，爲什麼又不能防患於未然呢？第二、在指出李立三於農村問題上，在土地革命當中，對於富農之妥協與聯合，是立三路線的錯誤。所以四中全會的決議案上說：『另一方面，在蘇區內對於立三同志過去的聯合富農的理論沒有充分堅決的鬥爭；對於組織貧農團和雇農工會苦力工會也沒有做任何工作，因爲地方黨部的完全疏忽，與由於立三政策的結果，使富農分子得以侵入指導機關爲他自己利益的獲取土地革命的結果，李立三所提議的集體農莊及一切過早的社會主義辦法，事實上不能不使富農地位反而更加鞏固，禁止貿易自由與土地買賣的指令，使蘇維埃的經濟狀況更加困難，這些錯誤，使我們和中農的聯盟受到危害，使極大多數農民羣衆的積



極參加蘇維埃運動，亦受到危害。」這兒要請讀者注意：中共所指斥的錯誤，其實就是中共及國際的錯誤，只怪李立三時運不齊，活該倒霉！要明白：李立三所執行的『聯合富農』政策，完全是『六大大會』的決議。在六大大會的政治問題決議案中，特別是第四項『革命運動的現時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一節內，不是明白的寫着：『聯合小資產階級富農，反對一切反動勢力』嗎？爲什麼反說是李立三的聯合富農政策不對呢？中共在經濟分析上，既然承認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承認：『中國農民的鬥爭，是反對一切封建束縛，反對農業之中的一切中世紀形式的剝削，而鬥爭的目標，是要推翻地主的封建式的剝削和統治力爭鄉村社會制度的完全民權主義化。』（見中共六大會土地問題決議案）這樣，中國既然是純民主性的土地革命，那末農村裏的對立，就不應該是地主富農（農業企業家）和農民無產者（佃農貧民），富農在這兒就有促進農村資本經濟發展的意義，主張聯合富農不但應該，而且必要！中共既然又在實際運動當中感覺到了要反對富農，那末，此種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法，還是純民主性的

嗎？這一點證明了中共對於中國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法之矛盾，對於中國的農村經濟的分析之茫然，理論與事實的不相配合，所以無怪乎在過去『蘇區』當中，常常有反富農路線之發生，自相殘殺，造了不少的萬人坑，所以聯合富農政策，不是真正李立三的錯誤，而應該是中共及第三國際應負其責。

此外，四中全會還檢討了立三路綫一些關於農民運動方面的枝節錯誤，但大半都是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辦法。上面所舉李立三主義的兩點錯誤，都不是李立三自己的錯誤，而是李立三這個革命的英雄主義者執行錯誤政策的錯誤！同時因為李立三是盲動主義的大師，所以不免在錯誤之上更加錯誤吧了。中共在這一時期當中，即是說，自四中全會以後，因為盲動主義的政策與黨內的內爭，各方面的實力均遭受摧毀，黨員當中起了分化，有的不相信有革命『高潮』，有的只認爲是『高漲』，不論高潮與高漲，都不外是詭辨名詞掩飾錯誤的一套『法螺』而已。中央政府在此時仍不斷地對中共所領導的紅軍加以圍剿，使『鐵鑄的蘇區』發生了恐慌和動搖，是在中共的蘇維埃區域內

，又發生了突圍與固守兩種意見的論爭，有名的羅明路線，又是承繼着立三路線而來的另一套把戲，在中共黨內，尤其是蘇區內，論爭甚烈。在江西瑞金這個梁山泊的忠義堂上，發生了保守山寨與下山搶人的爭執，結果是毛澤東這個宋江大哥要主張穩坐忠義堂上的第一把虎皮交椅，把一些主張下山搶人的哥弟，（大概當中有白勝時遷之流）大半用武力解決，於是羅明路線又告倒台，羅明路線，並不能代表中共的政治路線，羅明路線，僅僅是中共黨內一場無政治原則的自造萬人坑路線而已。

一九三四年中共蘇區因梁山水滸的無法固守，於是不能不放棄江西，退出瑞金，由毛澤東朱德二位宋江盧俊義大哥之率領，浩浩蕩蕩，殺奔西陲，奪取西川建基之大業不成，於是只有遠竄陝甘，直到陝北，成立忠義堂於膚施之上，這便是有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而中共的中央黨部，也跟着由上海搬到瑞金，由瑞金搬到陝北，在那兒去成立工人無產階級的大本營了。無疑地，江西的放棄和瑞金的退出，完全是蘇維埃運動失敗之表徵，但是中共特別富於阿Q精神，明明是逃竄，偏偏要說是打通國際路線，明明是

敗北，偏偏說是發展，而第三國際的代表米夫先生，還特別著了一本『英勇奮鬥的十五年』一書來吹噓，認爲是勝利。究竟是誰勝利了呢？讓事實去證明吧？讓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普羅戰士去解答吧？

中共到達了陝北以後，其主要的政策，便是放棄土地革命，高唱抗日，過去主張土地革命與反帝同時進行，現在主張反帝不能實行土地革命，中共對於過去革命的失敗，不能不說是有了一點了解，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由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爲止，中共的政策是高調抗日，主張立即對日宣戰，反對準備。本來中國之有國難，已將近百年，國難之嚴重危急，自九一八事變以後，只有日益加劇，中共當國家危急萬分之秋，並沒有發現中國有國難，需要民族革命，同時主張抗日必先打倒國民黨，所以才『乘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肆意擾亂，於淞滬之役，則猛攻贛州，長城各口之役，則猛攻撫州，危及南昌，使抗敵之師，爲之牽制。』（見國民黨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案）中共一直到了逃竄西北，窮守瓦窯堡的時候，才發現中國國難嚴重

，需要首先抗日，到西安事變以前，才知道國民黨可以抗日，中共於是由過去漢奸的理論與行動，轉變到民族革命之途，不能不說是一個大大的進步。

去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直到九月二十二日中共發表了宣言，正式接納了國民黨的四個條件：（一）取消紅軍及一切類似的武裝組織；（二）取消蘇維埃；（三）根本停止赤化宣傳；（四）根本停止階級鬥爭。同時更認為：『三民主義爲今日中國之所必需，本黨願爲其貫徹而奮鬥。』這便是國民黨容共的整個內容，中共於是由共產主義轉變到三民主義，由社會主義轉變到重視民族主義，走上了抗戰的前途，中共在此時的中心口號是：（一）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二）民主共和國，以民主爲中心，作爲號召羣衆的口號。有人認爲中共的此種轉變，是革命的轉變，是根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是無產階級的戰鬥方法，以退爲進的戰術。一般同情中共的人在這樣想，一般真正共產黨分子正這樣吹，究竟中共的新政策有沒有錯誤？錯誤又在什麼地方？在下節我們要特別加以說明。

總之，中共自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開始盲動主義起，一直到一九三七年秋發表宣言聲明信仰三民主義止，在這十年當中，中共的整個政策，是不斷地在盲動主義與機會主義的交互之下演進，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盡了不少阻礙的作用，這一點，希望以推動歷史發展，改造社會為任務的中共諸同志，靜靜地加以反省。

### 三、所謂新政策

中國共產黨的所謂新政策，其主要點是：（一）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二）民主共和的口號。自西安事變以後，中共的整個策略，都不出這兩個口號的範圍。照中共在『中國共產黨的策略路線』一文獻中的解釋，認為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目的是在孤立國民黨，是削弱國民黨的最有效方法。而民主共和的口號，則在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權，中共在國難異常嚴重的關頭，在表面上掉其如簧之舌，特別高調聯合抗日和民主兩口號，似乎認為非聯合抗日，不足以爭取最後的勝利，非實行民主，不足以號召廣大的羣衆來參戰。但是在這個政策的裏子面，全不是那一回事。中共的新政策之主要

核心，是藉抗日爲招牌，在抗日戰爭當中來準備和進行推翻國民黨的工作。所以中共的新政策，是陽奉陰違，具有有着兩面性；中國共產黨諸同志，則具了兩重人格，即：白天向着總理遺像三跪九叩，表示真心信仰三民主義，晚上又虔心向着馬克思列寧禱告，表示有信仰共產主義的苦心；這種矛盾的現象，便是所謂新政策的精隨之處，其結果，必然是對於三民主義冒牌，對於共產主義投機，既不是國民黨，又不像共產黨，作者之不同意於中共的新政策，並不是站在一黨一派的自私自利觀點上，帶上了顏色眼鏡和成見，故意與中共對立；而是認爲中共在目前所實行的新政策，頗多錯誤，其結果必然會毒害中國的民族革命，犧牲了全民族的利益，同時也犧牲了無產階級的利益。

國內有不少批評中共新政策的人，並沒有真正指出中共新政策的錯誤，只是注意於中共之陽奉陰違的陰謀政策。不知中共之所以變成了陰謀集團，不是偶然的現象，這正是證明了中共已經脫離了無產階級的立場，脫離了民族革命的立場，自身早已沒有一個堅決的集團背景，只是代表半殖民地下的大羣小資產階級份子之走頭無路！小資產階級

是急於要求出路的，於是不能不盡量應用一切陰謀手段；急功好利，盡量想爲自己開闢光明的前途。可是陰謀手段之不可作爲革命的主要策略，只要一看馬克思列寧等對於無政府主義（如巴枯林等）派之批評，就可知道。陰謀政策，只能作爲革命過程中爲了要達到某一目的的一種手段，今日中共之爲目的不擇手段，完全是破落的小資產階級之意識，與我們夙所主張的爲目的要擇手段，根本不同。中共既然聲明願與國民黨一道，願爲三民主義而努力，那末就應當明白中國國民黨的政治道德，仍然是『爲目的要擇手段』，中共如果還要留戀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末更應該明白馬克思列寧是反對無原則的應用陰謀手段的。目前中共的新政策，不管它表面上是如何的堂皇，如何的光明正大，完全是白天裝君子，夜晚作盜賊的一種偷偷摸摸的勾當。我們知道：革命行動，應該是一種光明磊落的行動，即馬克思所謂共產主義者，在人面前要不掩飾其政治主張；中共却完全相反，把神聖的革命行動，完全藉之於陰謀，不但是有意破壞了中國的人爲道德，而且是和馬克思開玩笑，打了馬克思的嘴巴。



現在我們從理論上來檢討中共的所謂新政策，它是否如中共所吹噓爲絕對正確？我想只要是客觀的研究者，都不難發現其謬誤之處。

第一、所謂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是否可以孤立國民黨？我以為是不會的！因爲目前的抗戰，事實證明了是國民黨爲主導，換言之，就是國民黨在領導着中國的民衆在抗戰，因而國民黨在此次抗戰當中，便有着主導和決定的作用。中國現存的各黨各派，如果要在抗戰當中發揮最偉大的效力，只有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才能把它們的抗日任務完成。以現存的事實來看，不是各黨各派平分秋色地聯合國民黨一致抗日，反而是國民黨聯合各黨各派，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爲抗戰建國而努力！所以前者是無主導的『聯合』，後者則是以國民黨爲主導把各黨各派聯合和集中起來，以加強抗戰的力量，所以目前中央政府，完全是一個整體，中央政府等於是一個大的磁石，各黨各派，都被這個大的磁石所吸引和集中了，這與西班牙的政府爲了抵抗弗蘭哥叛軍的進攻，由各種勢力來形成一個強固的聯合政權不同。因爲前者是一個具有主導的力量來聯合其他力量

，容納和集中其他力量；後者則是平分秋色式的聯合，由於聯合的形式之不同，主導力量與附屬力量對比之殊異，所以聯合各黨各派的意義，中國和西班牙的情形是不同的。中共在目前高呼聯合各黨各派，以為利用此口號就可以孤立國民黨，忘了只有主導地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來講聯合，事實上的加強抗戰的力量。所以各黨各派果真能聯合一致，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為抗戰建國而努力，這對於國民黨異常有利，只是加強了國民黨的勢力，絕不能孤立國民黨。可惜中共昧於此理，不懂得聯合的意義，在國民黨的力量居於絕對主導地位的今日，不知順應歷史的發展，促進中國的統一，反而高調各黨各派的聯合，企圖利用平分秋色式的方法來造成一個強固的政權，藉以孤立國民黨，以便從中操縱；忘了這樣辦法，事實上是破壞了統一，削弱了抗戰的力量。更忘了統一運動在今日之重要，一切為中國歷史發展的前途而努力的人們，不應該高調聯合來分裂統一，應該高調統一來促進歷史的發展，任何『聯合』意義的主張與宣傳，都只有在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之下才有進步的意義，只有這樣，才是應用聯合的方法來達到統一，而不是應用聯

們還不明白國民黨已經居於主導的地位，國民黨之不能接受此要求，不是國民黨之自私自利，而是中共太不了解政黨的集團力量對比之懸殊，所以中共的主張，便落空而不着實了。而且中共更不明白：所謂各黨各派，除了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共產黨而外，其餘如國家社會黨；國家主義青年團，中華民族解放大同盟，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三黨）……等集團，或則表示與國民黨完全一致，或則已經與國民黨溶化在一起，它們早已向着對立、聯合、溶化、這一個前途發展了！爲什麼？因爲這些黨派，本質上與國民黨相同，它們之必然聯合而統一於國民黨之下，完全是集團利益相同的道理，所以這些黨派，不待中共之高呼聯合，它們在相當時候必然與國民黨結合在一起，此種統一過程，乃中國歷史發展之所必然。中共昧於此必然，企圖以『聯合』來破壞『統一』，可謂

違反馬克思主義，又不了解三民主義，道理就在乎此。

第二、中共高唱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欲藉此以推翻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權，此種主張，犯了認不清楚時代的錯誤。國民黨在今天之形成了一黨專政，形成了一黨來掌握政權，是中國經濟發展反映在政治上的必然現象。中共同仁，天天在大吹其唯物史觀，可惜對於政治經濟學的了解過於貧乏，所以不明白國民黨能上台執政，把握了全國的政權，是有其深厚的社會經濟基礎存在。爲什麼？要明白近幾十年來國民黨的發展史，正是反映出了民族經濟在中國之發展，國民黨的最終目的雖在實現社會主義，在促進世界大同，但在目前還需要沿着民族資本的前途發展，因此，國民黨在現階段不能不代表民族資本的勢力，以走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在經濟上，就是促進民族經濟的發展，從建設國家資本這個橋樑，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之實現。目前國民黨的勢力之日益強大，能够取得全國的政權，正是民族經濟在中國有相對發展之主要的說明。既然國民黨之實行一黨專政有其社會的根據，而且此種根據在一天一天的加強，更增加了國民黨的力量之比

重，那末，中共想在此時來推翻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當然不可能！同時更忘了別人正推動着中國的歷史發展，正走着進步的道路，中共在此時只有幫助其成功，不應當阻止其發展，因為任何社會主義者應該力爭社會進化的發展，不應該以一黨一派的自私自利而阻礙社會的進化。

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其主要的意義，是中共想在此時此刻的中國，造成一個各黨各派聯合的政權，如美國或法國之多黨負責的情形相同。不知今日中國之實際情形，還沒有產生多黨負責政權的條件，中國歷史的發展，只選擇了國民黨來實行一黨負責，但這並不是排斥其他黨派，反之，更要容納和集中其他黨派的力量，使其他黨派，都爲着抗戰建國一個目標而努力！這就說明了國民黨雖實行一黨專政，可是並不拋棄民主的精神，國民參政會之產生，不是很好的證明嗎？所以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不應當解釋爲多黨共同負責，而應當解釋爲促進國民黨的民主政治之實現，使國民黨能真正走到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的前途。

#### 四、中國革命的領導問題

自抗日戰爭發生以後，中國革命的領導問題，又重新爲我們注意着，究竟，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屬誰？誰是這次民族革命運動的領導者？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不用說是中國國民黨！中國自開始民主革命運動以來，直到今天的抗戰爲止，領導這一革命運動的，主要還是中國國民黨，其他各黨各派，都沒有在這一革命運動當中佔着主要的重心，這是事實，無可否認！即以一九二五——二七年那次的大革命而論，中共雖代表了一部分工農的勢力來參加，但他們來作的完全是民主革命的工作，而且還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因此，中共之來參加了那次革命，只加強了國民黨的領導，領導革命的重心，並未因了中共之參入而變更。爲什麼？原於革命的性質沒有變更，革命的主導勢力沒有變更，工農的加入，正是民主革命運動之所必需，因此更加強了國民黨的領導，自是必然的道理。中共自那次大革命失敗過後，沒有真正檢討出真正失敗的原因，並且誇大了工農的領導作用。充滿於中共過去一般秘密的文件當中，幾乎千篇一律地認爲過去北伐之有相

####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當的成功，是有工農的領導；而北伐之失敗，是國民黨脫離了工農的領導所致。可是，一切客觀的研究者，能承認此種認識是正確的麼？當然不是的！要明白一九二五——二七年國民黨北伐之有相當成功，當然離不了工農的力量，也可以說是國民黨的農工政策收得了相當的效果。因為農工羣衆，不但是革命的主力，同時更是決定革命勝負的主要因素。國民黨在當時不但吸收了廣大的工農，而且更領導了廣大的工農在作反帝反封建的工作。很顯然，那次雖有廣大的工農參加，但絕不能據此便認爲是工農領導，抹殺了國民黨的領導作用，因爲他們既然服從了國民黨的政治路線，既然是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路線下努力，絕不是工農領導國民黨，而是國民黨主動地在領導着工農。中共如果說是代表了當時一部分工農力量的話，當然更不是得共產黨領導國民黨，而是國民黨領導共產黨。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失敗，主要是由中共的錯誤盲動政策負責。中共同仁直到今天，只知道罵當時國民黨反革命，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工作；忘了真正摧殘當時民主革命運動的，是第三國際及中國共產黨自己。要明白國民黨在當時要完成民

主革命，絕不怕帝國主義的勢力之如何堅強，而怕的是內在的威脅。中共一方面在當時既誇大了工農的領導作用，一方面又忽視了中國革命的階段與性質，別人正在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時候，却加緊力量來實行越俎代庖，並且故意誇大了工農的發展與要求，認爲非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不能過繼，結果便來了一個歷史上的反動，造成了一九二七年的大流血。中共不明白當時的工農運動之興起，正是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深入到中國的都市與農村後之主要的說明，真正爲害工農利益的，不是中國的民族資本者，而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買辦階級與封建勢力。因此工農的革命要求，不是打倒國民黨，而是應該擁護國民黨來打倒共同的敵人。中共認爲革命的要求，（特別是中國的托洛斯基派人物）已超出了民主革命的範圍之說，大半出於神經過敏，趕造革命所得出來的結果。

這樣看來，中國革命的領導權，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已經是用不着爭論的問題。不意在抗戰發生過後的今天，中共又大吹其牛，認爲此次抗戰是出於他們的主動，中國的革命，非由共產黨來參加領導不可。不知目前的中共，完全變成了小資產階級的集



團，真正的工農，已經次第脫離了中共，而逐漸集合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了。中共既然是號稱代表工農無產階級的，爲什麼無產階級要脫離了它？小資產階級既然在中共的黨內黨外佔得了優勢，其不能有獨立的革命作用，其不能完成特殊的歷史任務，這乃是社會科學之ABC的基礎知識，因之，中共便不能來參加今日中國之革命的領導權，只有在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才能完成其革命的歷史任務！不管中共在主觀上要企圖以國共兩黨的合作來領導中國革命，但在客觀上，必然是國民黨領導共產黨，因爲客觀的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都不可能具有獨立領導革命的作用呀！

中國共產黨在這次抗戰當中，似乎和國民黨力爭的還不是抗戰勝利問題，而是抗戰當中領導權的爭奪問題，所以毛澤東先生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一文中，（按：此文係四月十日在延安共產黨活動分子會報告提綱）認爲：『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够參加反帝反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正確點說，民族資產階級），由於他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方面歷史環境就會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

上已經證明了，因此中國反帝與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達到目的。』同時更謂：『並且只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堅持性與澈底性的充分發揚，才能克服資產階級的那種先天的動搖性，與不澈底性，而使革命不至於流產。』中共對於國民黨的認識，太缺乏了解，他們不明白國民黨所領導的民主革命，數十年來，都是在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工作，國民黨是民主革命的領導者，這是事實問題，不容毛澤東先生來加以武斷否認。如果說，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國民黨的領導，那末中共爲什麼要宣佈願爲三民主義而貫徹到底？願意服從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領導和指揮？如果說這一表示是假的，爲什麼又定要把國民黨作爲招牌？又爲什麼不乾脆宣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中共隨處是以無產階級的代表自居，而把國民黨認爲是資產階級，照毛先生的意見看來，中共在抗戰當中就天然富於堅持性與澈底性，國民黨具有先天的（？）動搖性和不澈底性，這一認識是否正確？客觀的事實是最好的批判。中共在此次抗戰當中，其武裝勢力在山西大半實行遊而

不擊的政策，甚或收編友軍的槍枝，擴充自己的實力，凡參加山西抗戰的軍隊，無不知曉。即以『功蓋天地』的平型關大勝而論，據實際的報告，殲滅敵人不過數百人，中共把它來誇大宣傳，藉以欺騙民衆，這難道是堅持性與澈底性之表現麼？恰恰相反，完全是不堅持和不澈底，完全是投機取巧，對於抗戰不忠實，是實行軍閥的割據作風。反之，國民黨却在這次抗戰當中作了壯烈的犧牲，抗戰已過過年，並沒有表示過動搖和不澈底，這是國人所眼見的事實，且容中共造謠誣蔑？可知毛澤東先生的認識，完全是帶了主觀的成見，並未根據實際的事實，這樣，中共之不可能來領導中國的革命，不是非常明白嗎？

托洛司基派對於中國革命的領導問題，也認爲應該打倒國民黨，所以托洛司基氏在『對於中日戰爭的意見』一文中說：『……我們從沒有否認共產黨與國民黨軍事上聯合的必要性，相反地，我們還是最初的指揮者。但是我們要求共產黨維持所有他的組織及政治的獨立，就是說，當內戰在反對區內的帝國主義代理人時，就正如一個國家的戰爭

在反對國外的帝國主義一樣，工人先鋒隊一面站在軍事戰爭的前線，一面在政治上便準備推翻資產階級，（按：係指國民黨）我們在目前的戰爭中是堅持着同樣的政策。』托洛司基這種主張，如果單純地站在黨派的鬥爭上來說，我們不能過度加以非難，因為不同性質的黨派鬥爭，雖然就有一時的聯合，其對立依然存在。問題是：當國民黨正走進步路線的時候，正領導着民衆在完成民主革命的時候，托洛司基派反要在政治上準備推翻它，這是爲敵人作了義務的漢奸工作，阻止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所以促進歷史發展和爭奪領導權以改變革命的性質，在這兒絕對不能相容。

作者謹以十二萬分的誠意來忠告共產黨當中的幹部派與托洛司基派諸同志，在大敵當前，正需要統一團結對外的今日，國民黨在全國各種抗日力量的對比上，已經佔着了絕對的優勢，國民黨事實上已經成了這一革命運動的主導者了，如果不援助其發展，而迷戀於領導權的爭奪，結果只有斷送中國的革命而已。

## 五、中國到何處去？

最後我們要討論的，是中國到何處去的問題。一般人對於中國這次抗戰，都懷着了兩大疑問：（一）中國的抗戰能否勝利？（二）勝利過後中國的前途究竟如何？關於第一問題的解答，我認爲中國能够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對內力求自力更生，勇於改正自身的弱點，對外能善於利用國際外援，以加強我們抗戰的力量，那末，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反之，我們的勝利條件減少，就是敵人的勝利條件加多，中國的抗戰就有失敗的危險，印度安南之續，很快就就在我們的眼前，中國於是走上了一條殖民地化的道路。關於第二問題的解答，我認爲中國抗戰勝利過後的前途，其性質雖是資本主義的，但是它必然是慢慢尋着三民主義的途徑，向着非資本主義的前途推進，因爲國民黨是以三民主義來建國，三民主義的理想與企圖，照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的講演當中來看，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這是說，在抗戰勝利過後，國民黨要用和平的方法，企圖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這就是以民族革命的徹底勝利過後，附帶解決民權和民生，不必如先進國家那樣，再來一次流血革命。總之，國民黨在抗戰勝利過後一定不會停滯在資

本主義發展的階段；它必然是外應潮流·內審國情，適應一般歷史發展的趨向，國民黨於是又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之澈底勝利過後，更消極地實行反對資本主義的工作。民主主義中之所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及建設國家資本……等等，都是消極地反對資本主義的政策，這樣，中國便由資本主義的發展，走到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了。

以上所述，是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來建國的實施步驟和目的，能否澈底實現？有待於國民黨及全國民衆之努力。萬一實現的程度不澈底，實現變成了改良，也不失其有進步的社會意義。要明白：改良不是反動，改良也是進化，不過它不是突變而是漸變罷了。

作爲中共的『最有威望和最有天才的領袖之一』（見米夫的話）的陳紹禹氏，（此處又可註明即王明）他把中國抗戰勝利過後的前途，認爲是：『……這一民主共和國的性質，雖不能有別於過去歷史時期中由資產階級革命結果所形成的歐美某些國家的舊式的民主共和國，但它還不是蘇維埃的或非資本主義性質的民主共和國，它將是而且一定是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勝利過程中產生的新式的民主共和國，即是一切參加對日抗戰到底的各種力量所共有的民主共和國。」（見解放週刊第三十期「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陳紹禹氏在這兒很明白的告訴我們：中國抗戰過後的前途，既不是資本主義，又不是非資本主義，那末這個「雜燴式」的民主共和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呢？其性質是什麼呢？談到此，使我對於這位「天才的領袖之一」的陳紹禹氏，他在其祖國——蘇聯吃了好幾年的牛奶麵包，寒窗苦讀了幾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竟發明出了在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的當中，還有第三種性質的東西出現，這東西就是「各種力量所共有的民主共和國。」但我敢於忠告讀者！陳紹禹此種認識，於理論不通，事實上也絕不會有，要明白中國的前途，如果在抗戰勝利過後，只有一個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之實現，我們爲這一民主共和國之實現而努力吧！

一九三八，七，一七日作。（抗戰與文化二卷三四兩期）

# 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中共的前途

## 一、兩種認識的對立

中國是什麼社會？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麼？這是今天每一個革命青年所需要解答的問題。大凡一種革命行動，都是一種有目的意識性的行爲，否則只能稱爲盲動，不能說是革命。同時，一種革命行動之正確與否，主要還在於認識之是否正確，這就是說，正確的革命行動，必需有正確的革命理論爲之指導，共產黨的導師列寧曾說：『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可見正確的認識和正確的理論，實爲革命行動之主要指標。

不幸得很！中國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十多年來都在錯誤的迷途上奔馳，直到今天，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這就是說，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是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何在？我以爲還不是客觀的勢力之壓迫和摧殘，而是由於主觀的認識不足



所致。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又安得不墮入深潭，無從自拔？所以領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國共產黨到今天之轉變，並不是出於偶然，而是出於失敗過後必然的歸宿。

爲什麼失敗？我以爲最主要的原因，是對於中國社會的認識之不足，因此，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便缺乏了深刻的了解，而盲動主義和機會主義之不斷的演進和發展，都是由於錯誤的認識所致。中共對於中國社會的認識，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估計，十多年來，並沒有過正確的一天，因之，其革命行動，也沒有那一次是正確的。自一九二五—二七年國共分裂以後，中國共產黨內部，發生了反對派與幹部派的對立，即托洛司基派與史大林派的對立，這兩派人對於中國社會的認識，中國革命性質的估計，不但不相同，而且恰恰相反，各走到一個極端。他們的理論鬥爭，可謂達到白熱化，由內部『無產者』刊與『佈爾什維克』月刊的對立，到外部『動力』月刊與『新思潮』月刊的對立，這兩派人對於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性質的爭論點，約言之如下：

1. 托洛司基派認中國社會爲資本主義社會，整個中國的社會都爲資本主義的經濟所領導或征服，封建經濟和封建勢力，自北伐以後，已經佔不着國內主要的重心，已經爲現代化的經濟勢力所破壞和征服，所以代表中央政權的南京政府，是一種佈爾喬亞的勢力。

2. 史大林派認中國社會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社會，他們認爲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征服，不在使其資本主義化，而在使其落後化，封建化，因之，帝國主義便是專門扶植封建勢力，以阻止中國經濟之發展，所以史大林派認爲代表中央政權的南京政府，是一種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勢力。

3. 托洛司基派認爲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有在社會主義的革命勝利之下，才可以把民主革命階段所未完成的任務解決。

4. 史大林派認爲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族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中共六次代表大會決議）因此，中國革命的性質，還不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範圍，這一革命任

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中共的前途

務本應由民族資本勢力來完成，不過他們認爲民族資本勢力脆弱而投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所以不能不由工農來越俎代庖了。

以上是代表共產黨中兩派人的對立意見，雙方都自詡在用唯物辯證法的分析，結果走到了兩個極端，這不是『真理』作弄了他們，而是他們在歪曲了真理，共產黨在中國の得意傑作，是常常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自吹自擂，好像馬克思列寧是一件最時髦最摩登的外衣，一披上便可使人起曲線的美感。不知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不是死的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中國共產黨人天天高呼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對於中國社會之認識與革命性質之估計，不但不合於中國的實際情形，而且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一些自負不凡的共產黨人，應該明白馬克思的三卷『資本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之構造和解剖，是多麼的正確而深刻；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一書，對於俄國當時的社會經濟之實際狀況的認識，又是多麼的正確而切實。可見一個比較偉大的革命家或革命行動，其成功絕不是偶然，一定有他的正確之認識爲其基礎。中國的共產黨呢，

不論反對派和幹部派，對於中國社會之認識和革命性質之估計，都未與真正的真理相合，反之與真理背道而馳；（如幹部派）嘗嘗得到令人不可想像的荒謬結論。

## 一一、托洛斯基派是怎樣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

自稱爲佈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中國共產黨，他們是怎樣了解中國革命性質的呢？無疑地，托洛斯基派之把中國革命認爲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是緣於把中國社會認作資本主義社會而來，這是邏輯之所必然，大體上還不如何錯誤。但托洛斯基派的主要錯誤，還不在於他把中國社會看作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在於他忽略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忽略了中國經濟的變態性和特殊性，忽略了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和多面性，因此，在托洛斯基派人眼中的中國社會或中國經濟，只有一般而沒有特殊，因此，只會了解一般常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發展，而沒有了解在半殖民地下的中國經濟，是怎樣的在被動和自動的矛盾中發展着。因爲只注意了一般而忽略了特殊，所以很多具體的事實，都爲抽象的觀念所代替，這是托洛斯基派在認識上，在方法上，其錯誤之所由來。

## 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中共的前途

### 四四

爲什麼呢？照托洛司基派人的意見，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既佔了優勢或領導，則中國社會必然爲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革命的性質，也必然是社會主義的性質。他們却忘了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半殖民地的經濟之發展，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在被自動的矛盾中發展。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對於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經濟，是具有傳導和征服的作用，這就是就資本主義要以原型來製造世界一點而言。其次，還要看中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它們在受了外資的傳導和征服以後，雖然在沿着資本主義經濟的軌道在發展，但此種發展，不完全是被動性的，它在被動的發展條件之下，有日益走向自動性的可能。這是說，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之發展，不全是買辦化的道路，同時也有民族資本主義化的可能，而中國近十年來的發展形勢，就是在不斷的被動和不斷的自動之下，民族經濟日益強壯起來，這一事實反映在政治形態上，很顯然是代表現代化勢力的中央政府，不但有其進步的意義，而且有其革命的前途。托洛司基派人大多只把握了中國經濟之發展，並沒有注意在發展過程中被動性與自動性的演變，甚至把買辦化和獨立化

等具體的事實都看得不甚重要，只把握一般而忘了特殊，不知此種特殊，正是決定革命性質的主要動力之一。於是他們又走到了兩個極端：一部分人又單從資本主義的發展之一般性來觀察，而認為中國的經濟是買辦化經濟；一部分人又未免太着重了中國經濟自身的發展，把帝國主義經濟的關係性分開來加以觀察，而認為中國經濟完全是獨立發展的，於是中國也變成了落後的帝國主義去了。此種錯誤，在方法上就是把特殊與一般對立，而沒有把特殊與一般統一，他們忘了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應當把外資與中資的統一和對立關係，作聯系的視察，藉以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被動性與自動性之演變過程，而不能向左右兩極偏頗，得不出正確的認識。因此，托洛斯基派人便只能了解中國經濟現況之一般性，不能具體了解中國經濟現況之被動性與自動性的矛盾統一，於是在理解半殖民地之中國經濟性質上，不認為它買辦化，就認為它獨立化，這是不了解半殖民地特性所使然。正因為中國經濟之具有半殖民地的特性，所以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具有最進步最革命的內容，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應該阻止其發展，反而應該促成其發展

，在此種情形之下，中國革命的性質，其決定點不全在於客觀的條件爲如何，而尤在乎主觀的力量。如果中國經濟的發展，被動性超過自動性時，那末中國革命的前途，規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在此種情形之下，不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都應當力爭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反之，自動性超過了被動性，這就是証明了民族經濟和民族資本勢力的強大和進步，那末中國民族革命的前途，規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尙不能超出民主革命的階段。共產黨在此種情形之下，如果主觀的力量異常充分，當有用不斷革命的方式飛躍到社會主義的前途，那末反帝的民主革命的完成，就是革命性質的轉變，這就是列寧托洛斯基等之所謂不斷革命的具體內容。反之，如今日中國共產黨之組織潰散，力量毫無，專憑一些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武裝，就欲越俎代庖，不但不可能，而且在此時來妨害了中央政府所作的民主革命運動，完全是違反社會進化，因而是反動的。

托洛斯基派人也口口聲聲不離工農，不離無產階級，但無產階級在什麼地方？爲什麼沒有被托洛斯基派人領導起來？反之，我們反見着很多地方，一些真正的工農羣衆，

反被沒有喊工農無產階級萬歲的中央政府領導起來在對日抗戰，這是表明了什麼呢？表明了半殖民地下的民族革命戰爭，民族利益於高一切，因而民族意識便戰勝了階級意識，在此種情形之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就應該站在抗日的最前線；爲保護祖國的生存而戰爭，中國變成了獨立自由，才是開闢社會主義的道路。然而中國的托洛斯基派呢？不是沒有站在前頭，而且是躲在後面，不但沒有積極的來參加，而且袖手旁觀，表示清高，似乎認爲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來抗日，大有羞與噲等伍之概。這一錯誤，是不了解今日的國民黨不但有進步的作用，而且在這一革命運動中有着主導和決定的作用。總之，都是由於不了解半殖民地的經濟特性之被動和自動性的演變所使然。一句話，他們通通忽視了由被動中自動發展起來的民族經濟會排斥外資，因而在政治上民族資本勢力會有堅決反帝的行爲。所以在此次抗戰當中，看不清楚中央政府的真實動向，天天疑神疑鬼，總認爲政府要妥協投降，而自己則陷於無口號，無路線，無辦法，無出路！總結一句：托洛斯基派人的缺點，在經濟上，是不了解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之特殊點，在政治上



，是不了解反帝的民族革命在半殖民地之中國之重要性。

### 三、史大林派是怎樣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

史大林對於中國革命性質之了解，與托洛司基派相反，前者走到了極左，後者便走到了極右。照史大林派對於中國經濟的分析，過去他們當中唯一的理論家如李立三潘東周之流，把中國經濟的現況，認為是封建的半封建的性質，於是，中國的社會，也就原封未動，是一個封建的半封建的社會。中國既然變成了封建或半封建社會，但他們却又高調要以無產階級來越俎代庖，完成民主革命。試問在封建半封建的社會當中，無產階級如何有領導作用？於是矛盾幼稚的理論，敵不過客觀的事實，李立三的理论終於被事實證明破產，繼之而起的，是沈澤民張聞天之流，把中國經濟的性質，換成半殖民地半封建，但這並不是較李立三們更進一步，而是企圖在半殖民地這個魔圈當中，發一點無產階級來。等而下之，如沈志遠何幹之之流，並沒有比李立三張聞天等高明，他們對於中國經濟性質之認識，都不過是在黨八股的指導之下，實行『文抄公』而已。

本來所謂「半殖民地」也者，這是個政治意義的名詞，幹部派人硬拉來與「半封建」結婚；把政治意義與經濟意義混淆，這有什麼意義呢？無非和新興經濟學開玩笑而已。其實，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實際上就是半封建之說明，這就無異是說，中國的社會，資本經濟與封建經濟都有其半，而所謂半殖民地，不過在指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缺乏獨立性吧了。然而幹部派人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之認識，始終不去把握其前進的，發展的部分，專門向後看，誇大封建的作用。第一，不了解中國經濟在被動自動的矛盾當中發展；第二，不了解中國經濟在被動的條件之下有自動發展的可能；第三，不了解資本主義經濟對於封建經濟的侵蝕和征服作用。因此，他們認為在帝國主義經濟支配下之中國經濟，只停留在半封建的階段，沒有獨立發展，走上現代化的可能。這一認識完全推翻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者將以原型來製造世界」的理論。幹部派人把中國經濟完全看成特殊，他們只會了解帝國主義者不願意中國經濟獨立發展，却不進一步去了解：帝國主義難道要故意使中國長久封建（？）？在其被動的支配之下，難道也不使中國經濟現代

化？因此幹部派人便有意無意地把中國的經濟發展隱藏起來，把現代化勢力認作半封建勢力，他們認中國的革命性質爲民主革命固然不錯，但他們之所謂反封建，恰恰是在反對富有進步的，革命意義的現代化勢力。因此，過去他們便拚命反對中央政府，認爲是反對半封建勢力，實行瘋狂的土地革命，認爲是搗毀半封建勢力的基礎，此種牛頭不對馬嘴的反封建革命，違反社會進化，不合科學方法，其失敗乃是必然的。

幹部派在過去之瘋狂地反對中央政府，瘋狂地實行土地革命，他們自以爲是在反對封建，在實行民主革命，可是至今還有大多數人不明白，中央政府的基礎，並沒有建立在土地關係上面；反之半封建的土地關係，已經逐漸爲現代化的經濟勢力所征服，已經逐漸改變舊有形式。如果說，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土地解決方式是土地的分配，那末十年後的今天的解決方式，至少應當注意資本的分配問題。過去共產黨那種土地革命的方式，自二萬五千里的逃跑以後，在中國永不會再現了。所以幹部派過去把有土皆豪，無紳不劣那種土地革命方式，自詡爲肅清了封建，完全是阿Q式的說教，只是消極地反對

了一部分封建勢力，患了真正反對封建肅清封建的人，是中央政府，是中國的民族資本勢力。一般地現代化的經濟勢力之支配全國，深入農村，必然會掃蕩封建經濟，動搖半封建勢力的基礎，年來很多半封建勢力之沒落和轉變，正是半封建勢力在不斷地被肅清之主要的說明。所以作為民主革命內容之一的反封建這一任務，真正的實行者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中央政府。這又說明了反帝反封建的兩重革命任務，因為封建勢力已經遭受了現代化勢力的征服和打擊，已經佔不着統治國內的重心，這一任務大體上已經完成，今後只有加緊肅清的意義存在。今後所留下的唯一任務，是反帝工作。那末我們今天之發動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的暴力侵略，正是在實踐反帝運動了。據此，可知共產黨把目前中國革命的性質認為民主革命，可是並沒有認識出民主革命的主要動力和內容，這由於他不了解中國經濟之發展所必然有的錯誤。所以在抗戰未發生以前，中國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總不相信政府會抗日，在抗戰既發生以後，又不相信政府會堅持起來。一些幹部派的英雄們，自今還津津有味在自詡西安事變的功績，

好像認爲沒有西安事變，中央政府就不會抗日，這批人都通通忘了沒有經濟上的發展，就不會有政治上的強硬這一經濟決定論的認識，西安事變，不過促成抗日戰爭之提前爆發而已！

幹部派人既然把民主革命的主要動力和內容認識不清，所以整個的政治路線，都側重在越俎代庖上，對內就專門與中央政府爲難，妨害中央政府的反封建工作。九一八事變到來，中共反熱心於土地革命，一二八上海血戰，中共紅軍正企圖衝出江西，包圍武漢，直逼金陵。抗日必先打倒國民黨，就是當時的中心口號，國民黨於是在內在的威脅和外來的壓迫之下，只好忍辱負重，而忍淚走上妥協的道路了。現在中共的政策總算是轉變了，因爲他們在九一八事變時還沒有發現中國有國難，需要民族革命，一直到退守瓦密堡，窮守在延安府的時候，才知道中國原來有國難，需要民族革命。不知中央政府在九一八事變過後就在鼓吹民族革命，爲民族革命作準備工作，中共則反對民族革命，認爲『民族』這一名詞是法西斯的專用品，現在中共也跟着民族革命起來，總算是法西斯

領導了中國共產黨吧？轉變了過後的中共，當然是與中央政府一體了，然而不然！中共已經忘了反帝與肅清封建殘餘是一個關係的工作，很多封建殘餘勢力，在抗日運動當中不會有什麼大的進步作用，反之，有投降日本，走上反民族革命道路的危險，如山東之韓復榘等，不是很好的證明嗎？可是轉變了過後的中共，却又專門去勾結殘餘的半封建勢力，把封建勢力特別畫出一副非常革命的面孔，而全民陣綫聯合陣綫等，便是買辦官僚封建殘餘以及失意武人政客流氓文人……等之大本營，牛頭馬面，聚於一堂，凡是中央政府所要肅清的人物，中共無不視為革命的寶貝，專門與國內的一些半封建勢力聯盟，於是過去反對封建的中共，現在反變為封建殘餘的維持者去了！中共的荒謬絕倫還不僅此，一個四川的國民黨員告訴我，中共在四川有人民陣綫（現在不叫這個名稱了——作者）的活動，而後台的支持者則為半封建殘餘勢力的某某，這批共產黨以及準共產黨可憐虫，在私人信函中公然稱某某為伯父，（註：這是他檢查信件看到的）但是，不幸他們的伯父已經作古了，在未作古以前和韓復榘幹了些什麼勾當？想國人已經知道了

。這些事實，足以證明中共聯合封建殘餘勢力之不當，救國反足以誤國。

以上就是中共（即中國史大林派）在民主革命運動當中之最得意的傑作，中共當中之不乏明達之士，希望把這一嚴重錯誤改正過來，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中共當中的一些優秀分子應加以猛省才是。

#### 四、中國革命之正確的認識

我既然不滿意於中國反對派和幹部派的中國革命理論，在中國經濟的認識上，不能不較他們更前進一步。我們承認反對派認中國經濟為資本主義經濟佔優勢，或中國社會為現代化社會這一意見，尚比較接近真理；但我們却不同意反對派對中國經濟發展，缺乏了內在的具體分析，或則把中國經濟的發展，以為是純殖民地的買辦化經濟；或則完全以為是獨立發展，與帝國主的經濟並無多少差別，而把它即使在獨立發展當中仍然帶了被動性一點完全忽視。我們也承認中國的封建經濟與封建勢力，仍然有相當的殘餘，但絕不如幹部派人所吹噓之甚。同時更不同意幹部派人把反封建認為主要任務，因之我們

之所謂反帝反封建，主要點是反帝，反封建不過在肅清封建殘餘。因之我們之所謂反封建即是在肅清封建，在反帝運動當中就應當同時進行，只有在這一聯係進行當中，民主革命才有最豐富的內容。因此，我們在中國經濟之發展的認識上，應該不要忽視以下這幾個具體事實：

第一，是發展的被動性。我們應當承認：中國現代化經濟的發展是外鑠，是在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者以長槍大砲傳導來的。不管在一八四二年以前，中國是否具備了一些先資本主義的條件，但我們絕不能否認，中國之有現代化經濟的發展，乃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情。正因為中國經濟之發展是外鑠，正因為中國經濟之落後而處於被動，於是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便支配了落后的中國經濟，所以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之發生和發展，始終沒有脫離外資的支配和控制。這一具體事實，證明了中國經濟之免不了要帶上買辦性，這證明了半殖民地的中國，在政治上需要反帝的民族革命的經濟的根據。



第二，是發展的自動性。儘管中國經濟的發展是處於被動，但一朝構成了國民經濟的系統時，此種被動性就有趨於自動性的可能。這好比文明人以新式武器的使用教訓野蠻人，目的在保護自己，但野蠻人一朝能使用新式武器以後，他也可以保衛自己，同時更可藉此以反對文明人了。中國經濟發展之必由被動趨於自動，還有一個內在的主要原因，就是國內地大物博，可以不需要國外市場而遂行原始蓄積的過程，可以不需要國外市場而可在國內推銷商品，擴大再生產的行程，這一優點，使中國經濟有獨立發展的可能。不過，中國在政治上沒有取得獨立自由以前，此種自動性還要多少受些被動條件的支配，因而也只是在被動條件之下的自動，這更說明了中國需要政治的勝利以保障經濟的發展，這是中國迫切需要民族革命之經濟的根據。

以上兩點，是為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發展之特殊性，它之在政治上需要對外的民族革命，絕不是偶然的！

第三，發展的變態性。因為中國經濟是在被動和自動的矛盾演變之下發展，因此不

能說它是買辦化，與印度安南沒有區別。同時也不能說它完全在獨立發展，與其他的資本主義只有程度上的區別。我們之以爲它含有變態性，就是在自動中含有被動的因子，這就是說在殖民地下的資本主義經濟，與正常的資本主義經濟多少有些本質上的不同，它要從被動中自動起來，必然要帶上進步的和革命的意義，所以資本主義經濟在半殖民地當中力求獨立發展，是進步而非反動，不能與一般資本主義一視同仁。何況中國的經濟是初期資本主義經濟，是剛由封建過渡到資本的階段，它是向上而非沒落，有進步的作用。

第四，是發展的落後性。中國的經濟發展之落後，最主要的原因，並不如幹部派人們的認識，以爲是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經濟的發展，而是由於自身受了經濟環境的影響所致。有人以爲這種見解是犯了地理史觀的錯誤，而不知地理史觀之在今天，正是解決中國經濟落後性的鎖鑰。這一問題，只有從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去求解答。總之，中國經濟是落後的，只有現代化的模型和雛形，故有人把它當作初期的資本主義。

第五，是發展的多面性。中國因為經濟落後，目前正是由封建到資本的過渡時期，是一個初期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以目前中國的經濟成分，非常之複雜，具有多面性。約言之，則有：（1）資本主義的經濟；（2）封建和半封建的經濟；（3）小有產的過渡經濟；（4）奴隸社會原始社會的經濟；（5）純粹殖民地化的買辦資本經濟。中國經濟之可以細分為如此衆多的成分，正是說明了中國經濟發展之不平衡，前進的地方非常前進，落後的地方則非常落後。就中當然以資本主義經濟佔優勢，它具有支配全國經濟重心的作用。其次封建和半封建的經濟，在中國也有相當的殘餘，很多比較後的落省份，尤其濃厚。小有產的過渡經濟，在目前特別衆多，這是由封建到資本制度之必然有的現象，此種現象只有短時期存在的。至於奴隸經濟及原始經濟，西藏川康青海等處，都有不少的地方殘存着。最後。所謂純粹殖民地化的買辦資本經濟，如我國今日之東北，即有其顯例。

總結言之，目前中國的經濟性質，是處於半殖民地下一個落後的初期資本經濟，中

國社會，是一個落後的初期資本社會。由於經濟的性質，規定了目前中國的革命任務，是應該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一革命性質，乃是民主革命的範圍，反帝反封建，就是民主革命的內容。對內肅清封建殘餘，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都是爲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必要中國獲得了獨立自由，真正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一革命性質才會完結。所以這一革命的主要領導和動力，是代表現代化勢力的中央政府，它應該領導全國民衆，一致來完成這偉大任務！

## 五、中國共產黨的前途

據上所述，可知目前中國所應進行的革命路線，是力爭資本主義的勝利，是促進國家資本的發展，要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必需從這一道大門經過。中國托洛司基派當中有一部份人，天天在幻想社會主義的前途，並且企圖在此次抗日戰爭當中就會得着實現，這完全是無政府主義式的空想，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不知目前中國的環境，在抗戰當中絕不可能有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前途，其原因：（1）中國的無產階級的政黨組

織之不健全，中國的無產階級之散漫，未達到自爲階級，缺乏了領導這一革命運動的主力。(2)共產黨企圖越俎代庖，在抗戰當中來起領導作用，必需抓住農民，與之密切聯絡，但今日中國之農民，已經在逐漸脫離了共產黨的領導，反之，中央政府却正當中共的土地革命失敗之後，勵行了農村的改良政策，已經逐漸把農民團聚於它的領導之下了。(可惜這一事實，共產黨人不願看見，且不願了解)(3)抗日戰爭是進步的民族革命戰爭，領導的主力雖由代表現代化勢力的中央政府，但却是帶了全民性的。因此階級意識絕不能戰勝民族意識，民族利益在此時是高於一切的。(4)緣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正處於進步性和向上性，故代表現代化勢力的中央政府，目前正具有進步和革命的作用，在此時妄想推翻它而越俎代庖，完全是違反社會進化，且與列寧所指示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不合。(5)中央政府在此次抗戰當中絕不會減削其勢力，反而是戰爭促成了它的飛躍進步，而且在這一抗戰當中就會日益強壯起來，在各方面都會得着合理的發展。這與軟弱無能的克倫司基政府及腐敗沒落的沙皇大不相同

。(6)中共缺乏了堅強的幹部和偉大的領導人物，(反之，却天天向黨內的優秀分子加以打擊和摧殘)既不能在這一偉大運動當中起黨團的核心作用，且其政治主張又復錯誤百出，不能預測革命的將來，不能估計事變的明日。根據以上六點來看，社會主義的前途，除了空想而外，怎麼會得着實現呢？

至於中國幹部派呢？明知這一前途不可能，而且已經自動把蘇維埃的招牌取下，自動宣言要爲三民主義而貫徹；但是取消了蘇維埃又要來一個邊區，信仰了三民主義還要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不但是矛盾，而且很令人誤會爲陰謀。中共是太不懂得如何來加強目前的民主革命，太不了解如何來推動這一革命運動之迅速完成，天天計劃以陰謀手段來買好人民，專門和國民黨爭羣衆，天天夢想如何造成自己的武力，幻想重過軍閥割據時代之光榮，他們把社會的進化，和自已應盡的革命任務，都忘掉乾乾淨淨了。他們還幻想以『坐收漁人之利』的辦法來奪取政權，而不知中國歷史的發展，會要証明這完全是烏託邦的幻想，會爲時代所遺棄。

然則中國共產黨的前途究竟怎樣呢？我以為：在目前還要空吹社會主義的前途，幻想蘇維埃的勝利，這不但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開玩笑，而且是昧於國情，只是在左傾的掩飾之下走反動的道路。固然，一個共產黨者縱使要爲着社會主義而努力，但今日中國的情形，是應該力爭資本主義的勝利，一切的社會主義者，都應該爲着這一前途而努力，這並不是開倒車，而是富有進步的革命意義。就社會主義的視點來看，必要使得中國獨立自由，是開闢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時打擊了日本，即是打擊了世界資本主義之最強固的一環，含有世界革命的意義。如果日本的國內，因了我們的長期抗戰而有爆發國內革命的可能，或從而再度引起了世界被壓迫民衆的革命運動，這於世界革命極爲有利，於中國三民主義之澈底的實現，也有莫大的助力。

所以中國共產黨在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真誠地來參加抗戰，爲了加強抗戰的集中力量起見，應該擁護政府，擁護領袖，並應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抗戰到底，爲中國的獨立自由而奮鬥！

二七年三月七日於西安大雪紛飛中（抗戰與文化一卷八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初版

著者 丁 逢 白

發行者 西北出版社

總代售 西安拔提書店

實價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KBC

G

693.0

70